

地方派系的資源配置策略： 以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爲例的 個案研究*

王宏文**

國立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及公共事務研究所副教授

柯昀伶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事務研究所碩士

孫寧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學系學士

分配政治文獻中常探討政治人物會將資源優先分配給誰，其實證研究的結果並不一致，可能影響因素如下：大選與黨內初選制度、資源的分配流程、選區人口特性，及政治人物的特性等。本文探討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量化研究結果顯示在此資源的分配上，陳縣長的影響力較大，立委們的影響力較小；陳縣長、張花冠立委及立委落選人陳適庸的地盤獲得補助的機率較高。這顯示並不是所有的支持者與游離者都是相同的，擁有在地資訊的現任者會考慮肉桶收買的成本、風險與效益，而會優先分配給一些具有某些特性的小團體或地方派系。

關鍵字：分配政治、補助、地方派系

* 作者誠摯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意見與建議，使本文更加完善，惟文責仍是由作者負擔。

** 通訊作者，Email: hongwung@ntu.edu.tw

收稿日期：106年3月28日；接受刊登日期：106年9月29日

壹、前言

分配政治所關心的問題是政府將不同的利益分配給誰？以及誰可以從政府的作為中獲益（Lasswell & Kaplan, 1950），在過去研究中，學者們通常會依據選民對現任政治人物的支持度區分為支持者、游離者與反對者，然後探討現任政治人物會優先或傾向將資源分配給哪一類選民（Kramon & Posner, 2013; Golden & Min, 2013; Costa, 2015）。

有學者運用模型推論現任政治人物應會傾向將資源分配給游離者（swing group）（Lindbeck & Weibull, 1987; Dixit & Londregan, 1996），許多的實證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理論（Wright, 1974; Dahlberg & Johansson, 2002; Stokes, 2005）。但也有研究顯示現任政治人物會將資源優先分配給支持者（Cox & McCubbins, 1986），也有一些實證研究支持這樣的理論（Anderson & Tollison, 1991; Couch & Shugart II, 1998; Crisp & Desposato, 2004; Larcinese et al., 2006; Vaishnav & Sircar, 2012）。

綜合近期研究，筆者認為學者們在檢視資源分配給誰的議題上，除了探討優先分配給支持者還是游離者之外，已經開始著重分析現任政治人物為何會優先分配給支持者或是游離者？其背後的主要原因為何（Kramon & Posner, 2013; Golden & Min, 2013）？在整理相關文獻後，筆者發現可能影響因素包含：大選與黨內初選制度、被分配資源的分配程序與制度、選區人口特性與嗜好，及現任政治人物的特性與策略等（Cox & Rosenbluth, 1996; Fenno, 1978; 盛杏媛，2000; Crisp & Desposato, 2004; Siavelis & Morgenstern, 2008; Kramon & Posner, 2013）。

此外，在過去研究中，多假設某一資源的分配是由一位或某一類現任的政治人物來進行分配，因此會針對總統、國會議員，或是縣市長的分配行為來做研究，然而事實上，一項資源分配的決策流程中，常常有許多政治人物的參與，每個參與的政治人物都有部分的影響力，最後的分配狀況應是許多政治人物共同決策的結果，但究竟誰會有較大的影響力，以及這會如何影響資源的分配，都是過去文獻中較少被探討的。

本文所選擇的研究個案是嘉義縣的社區營造資源，即創造城鄉新風貌資源的分配。¹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這項資源分配的資料較為透明，且過去有相關研究。羅清俊（2000）以此資源在各縣市的分配狀況來探索立法委員的分配行為，他認為立法委員能影響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² 另一方面，湯京平、陳冠吾（2013）則分析此項資源在嘉義縣內的分配狀況，其研究結果顯示陳明文縣長有可能透過這項資源的分配來鞏固及擴充派系的政治能量，因此縣長也會影響此資源的分配；故在嘉義縣內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上，縣長與立委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本文更將研究焦點放在 2002~2005 年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主要的原因有四：第一，當時的縣長與立委所面臨的選舉制度不同，³ 且在特定

1 Kramon & Posner (2013: 461-462) 整理過去分配政治之相關文獻，他們發現這類研究的進行方式多是以一項資源做為分配的客體（這可能是受到資料很難取得的限制），然後來探討政治人物如何將此項資源進行分配。他們認為這樣的研究方法，其研究效度是有限的，因為政治人物掌握許多資源的分配，因此政治人物心目中可能有一個宏觀的分配規劃，即可能會依照其個人目的或各地區不同的需求，將不同的資源優先分配給不同地區，因此針對某一項資源的分配策略可能並不是另一項資源的分配模式。本文也是以一項資源為研究個案，但筆者認為這項資源有幾個特色，可以降低上述所批判的問題。第一，嘉義縣內各村里對於社區營造資源並沒有很大或明顯的需求或偏好，也沒有哪些村里的特性可以被認為是社區營造資源應該優先分配給予的對象，因此這是一項沒有明顯優先順序的資源。第二，社區營造是陳縣長非常重視的政策，需要資源來推動，不僅能創造政績，且能強化縣府與社區的互動關係，改造派系的運作方式（湯京平、陳冠吾，2013），因此是陳縣長心目中很重要的一項戰略性資源。第三，在當時，嘉義縣內其他的政治人物或村里人士並沒有很看重此項資源（請見後續頁 178 的註 26），而陳縣長對此資源有一創意的想法與運用方式，因此陳縣長有可能主導此資源的分配（請見後續研究假設的推論過程）。因此，這項資源的分配很可能是與其他資源之分配是無關聯的，也就是不易產生下列情況：(1)陳縣長將社區營造資源分配給某些村里之後，就會對這些村里減少其他資源的分配；或是(2)陳縣長將其他資源分配給某些村里之後，就比較不會將社區營造資源分配給這些村里。綜合上述，陳縣長有可能主導此一資源的分配，且此資源的分配方式可能是與其他資源的分配沒有關聯，而可以減少 Kramon & Posner (2013) 所批判的信效度問題。

2 羅清俊（2000）發現在創造城鄉新風貌資源的分配上，若從補助金額來看，國民黨籍立委較多的縣市獲得較多補助款；但若從補助計畫的項目數來看，則國民黨籍較少的縣市獲得較多的補助項目，羅清俊的解讀是立委間會互相合作，避免因為資源的分配問題而產生抗爭，或將分配不均的情況揭露出來。

3 縣長選制屬於單一選區制（single member district，簡稱 SMD），立委當時的選制是複數選區單記不可讓渡投票制（single-nontransferable vote，簡稱 SNTV）。

的時空背景下，可以讓筆者探詢縣長與立委在此項資源的分配策略與行爲。在縣長方面，當時陳明文縣長剛從國民黨帶槍投靠至民進黨，並在 2001 年底的縣長選舉中獲得勝選，並企圖連任，過去研究指出在 SMD 選制之下，現任者會努力爭取肉桶，但對於爭取到的肉桶要如何分配，則又回到分配給支持者或游離者的問題。在立委方面，在 2001 年剛當選的立委也想要連任，立委在當時所面臨的則是 SNTV 制，過去研究顯示在 SNTV 選制下的立委們，有很強的動機去追求個人選票或經營某些次選區（subconstituencies），換句話說，也就是會將肉桶內的肉分配到支持自己的地區（Fenno, 1978; 盛杏媛, 2000; Crisp & Desposato, 2004; Hirano, 2006），在這樣的情況下，縣長與立委會如何分配此項資源，是值得探討的。

第二，過去分配政治相關實證研究比較少考慮政黨內派系的因素。有學者認為並不是所有的支持者與游離者都是相同的（Costa, 2015: 169），不論是支持者或游離者，每個團體的動員力量、政策偏好與程度，及政治目的是不同的，因此學者們認為現任政治人物會將肉桶內的肉優先分配給動員能力較強，對政策或政黨偏好程度較低，及以私人利益爲主的團體（Gottlieb & Larreguy, 2015; Cox & McCubbins, 1986; Dixit & Londregan, 1996; Novaes, 2014; Costa, 2015）。⁴

從當時陳縣長的角度的來看，在 2001 年縣長選舉中支持他的群體中，可能有陳縣長的核心支持派系，但也可能包含民進黨中原本就存在的山頭或其他

4 在分配政治的理論模型中，學者考慮許多因素，但在實證研究上，上述可能影響政治人物分配的許多因素並不容易衡量，且相關資料也很難獲得，因此大多數的實證研究仍是以分配者的得票率爲主要的研究變數（如 Anderson & Tollison, 1991; Crisp & Desposato, 2004; Larcinese et al., 2006; Horiuchi & Lee, 2008），也就是說假設支持者與游離者是同質的。僅有少部分研究能利用某些特殊的資料來源來檢視上述變數的影響，例如 Gottlieb & Larreguy（2015）將塞內加爾的村莊依據是否有投票所予以分類，來檢視分配者所擁有的資訊對於分配決策的影響。Costa（2015）是以秘魯村莊中的識字人口比率來代表選民所擁有的政治知識程度等。Cox & Rosenbluth（1996）則是利用日本自民黨內各個派系的不同屬性來進行研究。本文延續這樣的研究趨勢，利用嘉義縣內各派系追求私利的特性，並藉由其不同的勢力範圍、動員能力，及互動關係，來進行實證研究，以深入了解嘉義縣內政治人物的分配策略。

派系；⁵反之在沒有支持他的群體中，可能包含一直敵對的派系，但也可能有一些游離的派系。在分配政治研究領域中的過去文獻，除了少數之外（Cox & Rosenbluth, 1996），很少探討到現任政治人物在面臨政黨與派系的情況下，會如何來進行資源的分配，⁶因此陳縣長與這些立委們在這項資源分配上如何互動，可以加深我們對於地方政治、政黨及派系運作的了解。

第三，充實臺灣在地方層級分配政治的研究。臺灣目前較少針對地方層級之分配行為進行分析，目前搜尋文獻結果僅有羅清俊（2008）針對桃園縣長進行研究。而本文與羅清俊（2008）有兩個不同之處：首先，羅文所分析的是桃園縣長對特別統籌款之分配行為，其在分配時，需要考量各鄉鎮市的客觀需求，例如偏遠山區的特殊需求等；但本文所分析的是社區營造的經費，比較沒有客觀的標準來決定優先順序或規模的大小。其次，羅文使用鄉鎮市為分析單位，但本文使用村里為分析單位。

第四，提供一個有效分配的個案研究。從後續選舉結果看，陳明文縣長是一個非常成功的縣長，⁷過去研究顯示現任政治人物的特性會影響其分配行為（Fenno, 1978; 盛杏媛, 2000; 羅清俊, 2008; 楊永年、王宏文, 2017），

5 有學者認為山頭與派系有重要差異，山頭的動員系統比較不完整，其勢力消長取決於領導人的政治生涯，詳細說明可參見湯京平、陳冠吾（2013: 110-111），但本文是將派系與山頭在文中混用，因為這只是想要標明政黨內部各小團體的勢力。

6 臺灣地方派系的研究有很多的累積，但大多是在探討地方派系與選舉、政黨及民主化的關係與演變（如陳東升，1995；陳明通，1995；吳芳銘，1996；王振寰，1998；王業立，1998；丁仁方，1999；王業立、蔡春木，2004；王金壽，2004a; 2004b；趙永茂，2004），在臺灣分配政治相關的文獻中，有一部分是學者們對於臺灣地方派系分贓的研究，雖然多有提及派系分贓，但深入分析派系在資源分配上的研究並不多，少數如陳東升（1995）分析地方派系如何介入房地產開發案，以獲取鉅額經濟利益；湯京平等（2002）則探討地方派系對於地方政治生態之塑造與影響，並以臺中地方基層建設經費作為個案研究。這些文獻所著重的是分析地方派系在房地產開發或資源分配的過程中，如何獲得經濟利益的機制與原因，以及派系在資源分配決策過程中的角色及其影響，研究方法多以深度訪談法為主要研究方法；本文則是以政治人物為主角，利用量化與質化的研究方法來探討其如何將資源分配給各派系，以進行安撫或收買等策略，因此研究的焦點並不相同，研究方法也不同。綜合上述，臺灣過去有關派系分贓的研究多是探討某一地區內之多個地方派系在資源分配過程中的角色，以及如何獲得資源的機制；但較少探討若某一地區內的某一個派系掌握較大權利時，它會如何分配資源給當地的許多地方派系，這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

7 詳細資料請見本文第貳章第二節。

換句話說，每個政治人物都有不同的分配策略與行爲，因此有些政治人物分配行爲相對上效果較差，⁸ 本文聚焦在陳明文成功的案例上，可以提供學術界一個有效分配的個案。

綜上，本文的研究問題是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會受到縣長及立委甚麼樣的影響，是誰在主導此項資源的分配？其分配的策略與行爲又是如何受到政黨及派系的影響？筆者將以量化的研究方法來嘗試解答上述問題。

後續章節安排上，首先是文獻整理，我們將先回顧分配政治的相關文獻，然後整理臺灣及嘉義縣派系的相關研究。再來簡介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的緣起歷史與內容，然後發展出本文的研究假設，並說明本文的研究方法資料及分析結果，最後是結論與討論。

貳、文獻回顧

本節將分成兩大部分，首先呈現分配政治的相關文獻，特別著重在整理那些因素會影響現任政治人物將資源分配給誰。第二部分則是整理臺灣及嘉義縣派系的相關研究，以說明本文研究期間中，嘉義縣當時的派系與山頭的勢力與競爭情況。

一、影響資源分配給誰的可能因素

現任政治人物爲了追求連任或延續自己的政治生命，有很強的動機來對某些資源或政策，⁹ 進行政治性分配的行爲，以使自己未來選舉時的選票能最大化（Case, 2001）。政治人物會將資源優先分配給誰？既有的文獻可以區分爲兩大理論，一是游離選民優先理論。例如 Lindbeck & Weibull（1987）及 Dixit & Londregan（1996）認爲現任政治人物的支持者比較不會改變對他的支持，因此現任者會以肉桶來誘使游離選民改變支持的對象，故推論現任

8 過去研究很少探討分配策略在後續選舉中是否有效或是在政策效果上是否適當（Fiorina, 1981; Golden & Min, 2013）。

9 這些被政治人物用來分配的資源或政策通常有幾個特性：第一，分配政策所發生的成本是由分散的大眾所承擔的；第二，分配政策利益是由少數民眾所享用的（Golden & Min, 2013）。

者應會將資源優先分配給游離選民；許多的實證研究也支持這樣的理論，如 Wright (1974)、Dahlberg & Johansson (2002)，及 Stokes (2005) 等。

二是支持團體優先理論。例如 Cox & McCubbins (1986) 認為將肉桶分配給游離團體是一項風險很高的投資，因為現任者並不清楚游離者對政策或政黨的偏好程度，不確定需要花費多少資源才能改變其支持對象，此外，游離者在投票所內是否真的投票給他們也是不確定的，因此分配給游離者的效率可能不高，故 Cox & McCubbins 認為風險規避型的政治人物會將資源優先投注在其支持團體；¹⁰ 也有一些實證研究支持這樣的理論，如 Anderson & Tollison (1991)、Couch & Shugart II (1998)、Crisp & Desposato (2004)、Larcinese et al. (2006)，以及 Vaishnav & Sircar (2012) 等。

另外，有一些實證研究結果顯示政治人物會將資源分配給支持選民與游離選民之組合，例如 Fishback et al. (2003) 發現總統會將聯邦補助同時分配給支持選民與游離選民；又 Horiuchi & Lee (2008) 的研究結果顯示南韓總統會將資源優先分配給支持選民與反對團體。在臺灣的實證研究上，除了陳水扁總統的第二任任期外（李俊達，2010），¹¹ 其他研究結果皆是以游離團體為主（羅清俊，2008；王志良等，2012）。

綜合國內外相關的實證研究，雖然這兩種觀點都有實證研究結果的支持，但學者統計相關實證研究的結果，發現支持游離團體理論的比較多 (Golden & Min, 2013)，但為何有些實證研究結果顯示現任者會將資源分配給支持者呢？學者們提出一些不同的理論來嘗試解釋之，茲分述如下：

首先，Dixit & Londregan (1996) 認為在不同前提假設之下，游離團體理論跟核心團體理論都可能成立。假設游離團體中政治立場溫和者較多，則他們在接受到某現任政治人物的肉桶利益時，會比較容易改變立場而投給該

10 Cox & McCubbins (1986) 認為風險愛好者則會針對政治立場較溫和，也就是比較容易以利益來轉移其支持的游離者，給予肉桶好處，以換取其支持。

11 李俊達 (2010) 發現陳水扁與呂秀蓮在其第一任正副總統任期內，基於「和解共生」及「全民政府」的理念，地方參訪行程的安排呈現「游離團體較多，支持團體與反對團體較少」的「游離團體」模型。連任後，鑒於藍綠版圖難以跨越，其行程安排策略則改變為「支持團體」模型。

黨，則現任者就會優先將資源分配給游離者；但若游離團體的政治偏好很強烈，不容易用肉桶收買時，則政治人物會傾向將資源分配給支持者（Golden & Min, 2013）。

第二種理論是 Nichter（2008）所提出的提高支持者投票率（turnout buying）的理論，他認為游離團體理論的一個重要假設是，現任者將肉桶分配給游離者之後，必須能夠知道游離者的投票結果，如此現任政治人物才能評估肉桶買票（vote buying）的效果。Nichter 認為在秘密投票原則之下，上述假設是不能成立的，現任者無法知道選民在投票所中到底投給誰，但卻可以知道哪些選民有出來投票，哪些沒有，以及該投票所的投票結果，如此就可評估肉桶分配的效果，因此現任者會傾向將肉桶分配給支持者，以提高支持者的投票率，也就是透過動員支持者來最大化其得票數。

第三種理論則是認為現任者會將資源分配給支持者，主要是怕他們不滿意或背叛，導致投票率變低或是變成游離者（Diaz-Cayeros et al., 2012; Gottlieb & Larreguy, 2015）。

第四種是 Gottlieb & Larreguy（2015）所提出的目標團體理論，他們認為不論是支持者或游離者，每個團體動員或協調組織成員出來投票給特定對象的能力是不同的，因此他們認為擁有足夠資訊的現任政治人物會將肉桶優先分配給動員能力較強的團體，這可能包含過去支持他的團體，也包含一些政黨意識較弱，較容易被收買的游離團體。

上述這些國內外研究顯示現任者到底會將肉桶分配給誰，可能與現任者所擁有的資訊多寡，肉桶分配的風險、成本與效率，以及所面對選民的特性有關（Siavelis & Morgenstern, 2008; Costa, 2015），筆者整理相關研究，歸納幾個可能影響因素，茲分述如下：

第一，選舉制度及黨內初選或提名制度。在選舉制度上，相對於 SNTV 制，SMD 制會使現任政治人物為整個選區努力爭取肉桶，主要的原因是現任者在爭取到肉桶利益之後，能夠很明確的向選民邀功（Crisp & Desposato, 2004; Golden & Min, 2013），此外，選民也很容易對現任政治人物提出要求與課責（Lancaster, 1986; Balla et al., 2002; Golden & Min, 2013; 賴映潔、王宏文，2013）。但現任者在爭取到肉桶之後，要如何在選區內分配，過去研

究並沒有定論，這就是支持者或游離者優先的問題。

在 SNTV 選制下，因為在一個選區中有多位現任政治人物，若有一位現任者努力為該選區爭取到肉桶利益，則該選區內的其他現任者也可以宣稱有功勞而搭便車，選民在政治資訊不充分的情況下，很難判斷誰是主要功臣，在這樣的情況下，現任政治人物就不太願意為整個選區的利益爭取肉桶利益，但卻有誘因針對其核心的支持區或民眾，從事選民服務，以爭取個人選票。換句話說，SNTV 選制下的現任者應會將資源優先分配給他的支持者 (Fenno, 1978; 盛杏媛, 2000; 賴映潔、王宏文, 2013; Golden & Min, 2013; Crisp & Desposato, 2004)。

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政黨內部的初選制度對現任政治人物行為的影響是很大的，例如 Crisp & Desposato (2004) 認為不論在 SMD 制或是 SNTV 制，現任的政治人物都必須通過初選及大選的考驗，才能獲得連任，因此在某些情況下，黨內初選的壓力比大選還大，對現任者之分配行為也有較大的影響。

Siavelis & Morgenstern (2008) 則認為選舉制度對於現任政治人物行為的影響會受到許多政黨因素影響，例如政黨的大小、發展歷程、意識形態、派系結構、地區組織強弱、權力集中程度、財務狀況及領導層結構等，Siavelis & Morgenstern 認為這些政黨組織因素會影響政黨的候選人招募與選擇的過程與策略，¹² 並進而影響現任政治人物的效忠對象，有可能是某類型的選民，或是某地區的選民，或是黨內的領導精英等，而會衍生不同的分配行為。

最後，在黨內有派系的情況下，Cox & Rosenbluth (1996) 認為黨內的初選制度與派系的運作會影響現任者的行為，這是因為黨內派系在初選時會有競爭，甚至在初選落敗後，有些派系還可能放話不會退讓，在大選中一樣出來競選，瓜分該黨的票源，因此要如何避免黨內派系在初選及大選的競爭壓力是現任者的重大議題。

第二，被分配資源的決策程序與制度。過去研究指出被分配資源的決策

12 Siavelis & Morgenstern (2008) 認為政黨如何招募或選出代表黨的候選人，有很多不同的機制，例如由黨內高層領導人指定、由主要幾位領導者協商、由地區黨部推薦、由黨員選舉決定，或是由民調決定等，因此現任者或挑戰者為了獲得政黨提名，就必須了解黨內招募或選擇機制，並對掌握提名權力的人或團體效忠，以獲得提名，維繫其政治生命。

過程與法規制度也會決定現任政治人物的分配策略，例如，有些資源的分配是依據一定的公式來決定分配金額，在這情況下，政治人物就很難插手；但有些資源的分配在決策時，需要經過一定的審查，而政治人物可以藉由指定審查委員或是表示意見來影響審查結果，則這些資源的分配就容易受政治人物影響（林怡均、黃紀，2009）。

第三，選區人口的特徵與特性。過去研究顯示，若某一地區選民對於某政黨或政策的傾向非常明顯，則獲得分配的機率也會降低，換言之，現任者會比較傾向將肉桶分配給政策或政黨傾向較弱的、容易改變支持對象的、以私人利益為優先的，以及資訊有限的團體（Costa, 2015: 171）。

第四，分配者本身的特性與想法。因分配決策最終還是由現任的政治人物來決定，因此政治人物的性別、年齡、學歷、過去經驗、所屬政黨，及對未來政治目的企圖與野心等均可能影響利益之分配（Fenno, 1978; 盛杏媛，2000；羅清俊，2008；楊永年、王宏文，2017）。例如李俊達（2010）發現陳水扁總統在第一任與第二任任期對於政黨合作時的想法是不同的，導致陳總統在巡視地方的時間分配策略有所不同。又如 Crisp & Desposato（2004）發現企圖連任的以及欲上一層樓的現任政治人物會比較積極從事選民服務與肉桶分配。

另外，現任政治人物所面臨的選戰激烈程度也會影響他們的分配行為（Cox & McCubbins, 1986; 羅清俊、萬榮水，1999；Stein & Bickers, 1995; 羅清俊、陳文學，2009；王志良等，2012；賴映潔、王宏文，2013），若現任者在上次選舉中是險勝的，則會較優先回應其支持者的需求（Golden & Min, 2013; Crisp & Desposato, 2004）。

最後，現任政治人物擁有地方選民資訊愈多，愈傾向將資源分配給支持者（Nichter, 2008; Golden & Min, 2013），如 Gottlieb & Larreguy（2015）認為現任者將肉桶分配給支持者，主要的原因是現任政治人物了解支持他們的團體的動員力量，若不給予他們利益，這些團體支持他的力量會下降，甚至可能會變成游離者，投票給他們的意願就不高了，換言之，現任者只要擁有夠多的資訊，就會知道各團體或派系的動員力量為何，而會將目標放在動員力量強的團體，這可能是過去支持他們的團體，或是黨派意識較弱，而有可能

被收買的團體。

二、嘉義縣派系的相關研究

在臺灣的地方派系研究中，¹³ 恩庇侍從理論認為威權時期國民黨會利用一些方法來控制地方派系，例如在一個縣市扶持至少兩個以上的派系，並讓派系輪流執政，以防止任何一派過於強大的雙派系主義，另外，國民黨也會藉著對縣市長、縣市議員、農會、水利會，以及村里長的提名輔選等來攏絡派系（Firth, 1957; 朱雲漢，1989；陳明通，1995；吳芳銘，1996；Wu, 1987; 林佳龍，1998）。

在解嚴及民主化之初，縣市、鄉鎮與村里正式層級的政府職位多由國民黨控制，民進黨很難有效切入此一地方動員系統，故民進黨便轉以社區作為耕耘基層的方法，其中社區營造提供政黨及地方派系新的資源與動員管道，成為派系常使用的一項政策工具（蔡育軒等，2007）。¹⁴ 例如劉如倫（2004）便以嘉義縣的社區為研究個案，他發現雖然社區的申請計畫是由下而上，但行政首長擁有相當大的決定權，研究結果顯示行政首長會將補助資源優先分配給具有侍從關係的社區。

在嘉義縣的政黨與派系勢力分布情況上，長期是由黃派與林派控制地方的政治版圖，¹⁵ 在解嚴後出現第三勢力「蕭家班」，而民進黨成立後也佔有一席之地（陳泰尹，2009: 40）。在2001年以前，嘉義縣由國民黨長期執政，黃林兩派皆屬國民黨籍，黃派的李雅景在1994至2001年擔任嘉義縣長，依

13 臺灣學者對於派系有不同的定義，例如趙永茂（1978）認為地方派系是以利害為主、無正式組織且短暫結合的一群人，領導方式是靠個人關係；陳明通（1995）認為派系是基於恩庇侍從關係所形成的非正式團體，依附既有的政治社會體制，卻有獨立的動員與監控能力，此外還能透過集體行動來爭取公部門或準公部門的職務，以轉化為派系的資源。不論其定義為何，基本上派系的形成可以從關係、利益、及面子等角度來理解（張茂桂、陳俊傑，1986）。

14 蔡育軒等（2007）認為社區發展協會之地理範圍與傳統的村里相近，功能上也有重疊，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社區發展協會可以透過各部會之經費補助來掌握資源與人力，使派系有介入的空間，因而成為派系可以操作並動員的網絡系統。

15 黃、林兩派自黃老達（第五屆嘉義縣議長）、林振榮（第六屆嘉義縣議長）在1960年代先後擔任嘉義政治要角後，成為嘉義縣主要派系。黃派當時是以國民黨籍的李雅景與翁重鈞為核心，林派則是由民進黨籍陳明文、張花冠為首要人物。

照派系輪流執政的邏輯，應該由林派推出人選來參加2001年底的縣長選舉，但黃派與國民黨中央關係良好，¹⁶因此國民黨在2001年縣長選舉中，仍然推派黃派的翁重鈞參選，引發林派的不滿，原屬國民黨林派的代表人物陳明文，因此憤而宣布退出國民黨，並爭取民進黨提名來參選縣長。

陳明文首先在民進黨的初選中，險勝原本可以獲得縣長選舉提名的何嘉榮，然後又在縣長大選中，以47.22%比44.25%打敗國民黨的翁重鈞，當選嘉義縣長，並在2005年克服民進黨中央執政不佳的不利情況，連任縣長，其得票率由47.22%上升至62.69%，更在第二任期間讓民進黨在嘉義縣議會取得多數黨，達到完全執政，使嘉義縣由國民黨票倉轉而成爲民進黨地盤，稱爲「陳明文模式」（林正忠、范振和，2009）。

地方派系的政治菁英投靠黨派的情況雖不算罕見，但如陳明文這樣帶著地方動員能力，由上而下全系統往民進黨靠攏的卻非多數。正因爲林派陳明文積極鞏固的是效忠地方派系與個人，而非政黨，因此在國民黨於2001年提名黃派翁重鈞時，陳明文的支持者毅然追隨陳明文腳步，而放棄對國民黨支持。¹⁷

對民進黨而言，陳明文的加入儼然將民進黨與林派的勢力結合，大幅提高民進黨在嘉義縣的勝選機率與政治影響力。對陳明文而言，向當時在中央執政的民進黨靠攏，意味著在參選及未來當選時，能擁有更多從中央來的政治資源，無論是公共建設如高鐵設站、長庚醫院啓用、故宮南院設立等，都看出陳明文在其第一任內所爭取到的實質資源（蔡英志，2006）。

然而，林派與民進黨的合作雖看似互惠互利，兩者之間的相互矛盾與保留仍是存在的。對林派而言，支持民進黨只不過是換了一塊招牌，對於派系本身的認同並未改變，因此與民進黨的關係需要磨合，甚至需要加以懷柔安撫（莊卓穎，2014）。換句話說，爲了勝選，在嘉義縣內原本基本盤佔二、三

16 請參見（湯京平、陳冠吾，2013）。

17 在派系政治的運作上，主要是由政治人物透過長期維繫的人際網絡，將政策利益及面子等輸送給草根的支持者，以換取其政治的忠誠，其特色或本質就是我群優先及利益分配，換句話說，有限資源的分配必須考慮投資報酬率，最有效的利益分配方式則是透過既有的社會網路，一方面選擇投資對象，另一方面則是用來培養及維繫投資對象的忠誠（湯京平、陳冠吾，2013）。

名的林派與民進黨被迫結合以打敗長期執政的國民黨政權。然而實際上兩派人馬的認同與效忠仍有所不同，對於民進黨原本的山頭勢力而言，林派的加入會排擠自身生存的空間，民進黨和派系必須要協商以權衡對兩者皆有利的資源分配。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中央直接將經費下放，讓地方派系自行運作，如今地方政府則必須自行想辦法爭取資源以經營地方，鞏固地方派系的支持（蔡英志，2006）。故陳明文選擇從社區營造著手，不僅能協助社區發展與建設，還加強縣政府與社區的互動關係，更也改造了派系的運作方式（呂嘉泓，1999），這不僅是陳縣長任內的重重大政績之一，實質上也成為陳明文控制派系勢力的重要手段（湯京平、陳冠吾，2013）。此外，為了打造終結派系，清流共治的訴求，陳縣長會想要廣發此項資源，甚至對於黃派人士，也可能想要招降納叛，如果無法招攬，也會盡量保持未來合作的空間，以降低反對的力量（莊卓穎，2014）。

最後，本文針對嘉義縣 2001 年立委選舉中，主要參選人的派系背景進行介紹，¹⁸ 如表 1 所示：

表 1：2001 年嘉義縣第五屆立委主要參選人之派系背景

民進黨	國民黨	親民黨	台灣團結聯盟	無黨籍
蔡啓芳 (純民進黨 ¹⁹)	李雅景 (黃派)	陳適庸 (小黃派 ²⁰ ／偏林派 ²¹)	黃譚輝 (無 ²²)	張花冠 (林派)
何金松 (純民進黨 ²³)	蔡吉輝 (黃派 ²⁴)			張淳美 (無)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8 2001 年嘉義縣的立委選舉中，共有 10 位候選人，扣除最後得票率不及 1% 的蔡政崇與羅哲文兩位候選人之後，尚有 8 位主要候選人。

19 黃榮清將蔡啓芳歸類於純民進黨員，資料來自黃榮清（2000: 53）。

20 資料來自黃榮清（2000: 41-42）。

21 資料來自陳璿仁（2002: 106-108）。

22 資料來自陳璿仁（2002: 125）。

23 資料來自陳璿仁（2002: 133）。

24 資料來自黃榮清（2000: 47）；陳泰尹（2009: 129）；陳璿仁（2002: 135）。

表 1 顯示民進黨的參選人有兩位，蔡啓芳在 1990 年當選布袋鎮鎮長，是嘉義縣第一位民進黨籍的鄉鎮市長，為民進黨內重要的山頭人物（蘇錦章，2001: 135；陳璿仁，2002: 115；蔡英志，2006: 47-48）。另一位民進黨籍參選人是何金松，他在 1986 年加入甫成立的民進黨，為創黨黨員之一，1994 年當選嘉義縣議員，1998 年連任，2000 年擔任民進黨嘉義縣黨部主任委員。

無黨籍參選人張淳美，為嘉義縣政治人物何嘉榮之妻，因何嘉榮在 2001 年民進黨縣長初選中敗給陳明文，加上官司纏身，遂由張淳美在 2001 年的立委選舉中代夫出征競選。至於何嘉榮的政治履歷如下：1985 年時國民黨提名何嘉榮競選嘉義縣長，並獲得當選，但在 1989 年競選連任時，國民黨內訌，黃派支持陳適庸，林派支持何嘉榮（陳璿仁，2002: 105），結果何嘉榮在國民黨內初選失利，退出國民黨，並在 1993 年加入民進黨，代表民進黨參選縣長，但敗給李雅景（黃榮清，2000: 43）。整體而言，何嘉榮從國民黨籍縣長，在初選失利後，加入民進黨，爾後又退出民進黨。

另一位無黨籍參選人張花冠，是「涼椅大王」曾振農之妻，曾振農起初和國民黨黃派往來密切，但 1992 年立委選舉時，曾振農與翁重鈞兩人競爭太激烈，導致其與黃派掌門人李雅景發生衝突，在與黃派疏遠之後，成為林派陳明文盟友。在陳明文加入民進黨之後，曾振農與張花冠也宣布退出國民黨，並給與林派許多資助，亦將其班底帶入林派，是陳明文當時的重要盟友（陳璿仁，2002: 110），張花冠亦於 2004 年加入民進黨，是林派主要人物（莊卓穎，2014: 122）。

國民黨籍參選人李雅景是黃派領導人，曾任嘉義縣議員、臺灣省議員，1993 至 2001 年任嘉義縣縣長。蔡吉輝亦為黃派人士，當時與李雅景關係良好（唐賞蓉，2002: 125）。台聯參選人黃譯輝原名黃永聰，曾任民進黨黨部主委、民進黨籍省議員，因不服 1998 年第四屆立委選舉民進黨內初選結果，脫黨加入當時新國家連線，自行參選立委。

親民黨籍參選人陳適庸為第十一屆嘉義縣縣長（1989 年當選），原屬於黃派（莊卓穎，2014: 121），在 1993 年欲競選連任時，黃派與陳適庸發生衝突，李雅景甚至出來爭取黨內提名挑戰陳適庸，黃派正式分裂成由李雅景領導的老黃派，以及以曾振農與陳適庸為主的小黃派（黃榮清，2000: 41-42）。

李雅景在贏得 1993 年縣長選舉後，曾振農與陳適庸脫離國民黨與黃派，轉與林派結盟，並在 1994 年省議員選舉，共同支持陳明文（陳璿仁，2002: 106-108），故陳適庸從黃派人物，分裂出小黃派，再轉為偏林派。

參、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簡介與研究假設

本節將先簡介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的源起歷史與內容，然後綜合上面文獻回顧中的理論，嘉義縣派系與山頭的勢力與競爭情況，及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的特性，來發展本文的三個研究假設，並一一說明之。

一、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簡介

臺灣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形成髒亂擁擠的地貌，為了改善這情況，內政部在 1997 年研擬「城鄉景觀風貌改造運動」實施計畫；爾後，搭配行政院積極推動的「一鄉鎮一特色」原則，為落實「魅力臺灣」之施政目標，自 1999 年起，營建署開始編列預算並推動，至今已完成三期計畫，分別是第一期的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1999 年至 2005 年），第二期的城鎮地貌改造——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2005 年至 2008 年），及第三期的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示範計畫（2009 年至 2012 年）。

其執行方式是由各地區或各社區來發掘地方特色，並撰寫計畫書，鄉鎮市區公所提交申請補助計畫書給縣市政府，縣市政府在統合後進行初步審核，然後交給內政部營建署審核，並由各相關部會及學者專家組成的評審委員會審查。審查通過後進行經費撥付，計畫補助期間為一年期，補助金額約二百萬元，期許各地區以社區總體營造的方式，推動「由下而上」的地方建設方案。但事實上，鄉鎮市政府、村里單位或社區協會有可能不知道、不了解或沒有足夠的能力撰寫企劃書的情況，因此許多社區沒有提出社區發展計畫書，也就無法獲得補助。

在嘉義縣，陳明文縣長非常重視社區發展，陳縣長會指派社會局官員到某些村里或社區，來協助這些單位撰寫企劃書，並成功爭取到許多中央的補助。然後將這經驗持續推廣，甚至與張花冠立委成立一個非正式編制的聯

盟，結合縣府與立委的資源，來統籌輔導縣境內的社區發展（湯京平、陳冠吾，2013），這些都顯示陳縣長對此項資源之分配是非常重視，且其參與程度是很深的。²⁵ 在立委方面，筆者搜尋網路資訊，除了張花冠立委與陳縣長合作之外，其他立委很少有公開協助社區的資訊。²⁶

從上述城鄉新風貌補助款的申請及審核流程來看，雖然該計畫是希望由下而上的提出計畫案，但受限於社區的能力與時間有限，除非有熱心的地方人士參與，否則社區很難提出不錯的計畫書。此外，社區提出計畫書之後，尚要接受縣府的初步審核，但從與陳縣長敵對派系的角度來看，則很可能會自我篩選，或是怕被別人認為有叛變的可能，而不會提出計畫申請案（湯京平、陳冠吾，2013: 125）。

但若社區的計畫申請案有現任立委的支持，則縣府為了保留在中央共同爭取資源的合作空間，可能不會刪除這些申請案件，而會在審核後送到中央部會進行審查，由於立委對於內政部有相當影響力，因此這些申請案獲得通過的機率會比較大。

因此本文推論：接受本計畫補助的地區不是隨機的，真正從下而上發起的計畫很少，大部分的地區受到陳明文縣長或立委們的幫助，才獲得補助。但如羅清俊（2000）與湯京平、陳冠吾（2013）兩文所發現的，到底是縣長還是立委們的影響力比較大？則需透過實證研究才可獲得較深入的了解。

25 嘉義縣社區營造政策之補助會在縣內經過一公開選拔社造計畫之過程，評審多為當地學者，因此縣府不易操弄審查結果。此外，社區在獲得補助後，通常會將經費用在美化環境、推動健康照護、辦理媽媽教室、長壽俱樂部、或藝文班隊等，透過參與與受益的民眾，社區營造協會可以拓展或鞏固人脈，形成一個很好的社會網絡。最後，社造結果會透過觀摩學習而受到大家檢視，甚至有可能代表縣府參加全國競賽。因此對於陳縣長而言，若想要將此利益帶給某地區，最好的作法是先給予輔導，使它們能提出較好的計畫書，並培養相關人才，使其能在審查時脫穎而出（湯京平、陳冠吾，2013），並能夠妥善運用補助資源。因縣府社會局官員了解社造資源的申請流程，也看過許多好的案例，了解評分重點等，因此若某些地區能夠得到社會局官員的協助來撰寫計畫書，則獲得補助的可能性將會大增。細節請參考湯京平與陳冠吾（2013: 119, 124-125）。

26 筆者查閱相關資訊，並沒有發現嘉義縣立委們在當時有投注許多心力來協助村里撰寫計畫書，少數新聞或案例是：何金松擔任嘉義縣民雄鄉北斗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二、研究假設

綜合上述文獻回顧中的影響因素、嘉義縣的政治生態，及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的申請與審查流程，本文想要探討在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上，究竟是由縣長還是立委們主導？以下從幾個方面來進行分析：

第一，就選舉制度來看，雖然縣長與立委的選制不同，但陳縣長較有誘因去爭取此項資源。首先，縣長選舉是屬於 SMD 制，過去研究顯示現任者在這樣的選制下，會比較有誘因爭取肉桶，且陳縣長剛帶槍投靠民進黨，又在縣長選舉中險勝，因此陳明文縣長需要透過獲得這些計畫的補助，來向嘉義縣民展現他是有能力的，從發出訊號的角度來說（Stokes et al., 2013），陳縣長需要中央政府通過他所支持的申請案。

其次，立委們在 SNTV 選舉制度下，會有誘因來爭取個人選票，但他們可以使用的工具或方式有很多，例如拜訪選民、解決選民的個人問題、爭取地方建設與補助、參加社區活動及喜慶活動等（Fenno, 1978; 盛杏媛, 2000; Crisp & Desposato, 2004），在這樣的情況下，社區營造資源所提供的補助金額並不多，也不是立委習慣採用的選區服務方式，因此可能比較不會積極爭取。

第二，從資源的申請與審核程序來看，陳縣長的參與及努力程度較高，故其分配應是由陳縣長主導的。雖然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補助有一定的申請與審核程序，但如前所述，在這過程中，立委可以透過許多管道來向行政機關施壓，陳明文縣長則是直接指派縣府民政局官員來協助一些村里人士撰寫計畫，並與張花冠立委合作，來進行申請作業，因此就整個申請與審核過程中村里獲得的協助程度來看，陳縣長與張花冠立委這一套機制比較佔優勢，因此，此項資源在嘉義縣內的分布狀況應是由陳縣長來主導的。

第三，從分配者的想法來看，陳縣長會較有誘因來主導此項資源的分配。社區再造是陳縣長的主要政見之一，²⁷但在嘉義縣財政困窘的情況下，非常需要中央政府資源的挹注，雖然每筆計畫案的補助金額並不多，但對於

27 請見湯京平、陳冠吾（2013）。

獲得補助的村里與社區來說，不論民眾原本是否支持陳縣長，都可以享受到這項補助所帶來較好的社區設施與活動的好處，對於陳縣長所強調的終結派系目標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陳縣長才會積極派遣縣府人員至各村里幫忙撰寫計畫書，並與張花冠立委成立平台來協助此項計畫的申請。

第四，從政黨尋求地方代理人的角度來看，民進黨中央會積極支持陳縣長。從陳水扁總統或民進黨的角度來看，資源的分配本來就是要攏絡地方領導人 (Weghorst & Lindberg, 2013; Novaes, 2014; Costa, 2015; Coman, 2016)，²⁸以擴大其支持的基礎，因此他們會引進能夠掌握較多選票的地方政治人物。

陳明文縣長在 2001 年帶槍投靠，帶著林派從國民黨轉移至民進黨，並獲得勝選，顯示陳縣長的確能掌握較多選票，因此民進黨才有可能在嘉義縣第一次贏得縣長選舉，因此，中央行政機關有可能會比較配合陳縣長的需求，來分配此項資源，以攏絡陳明文縣長 (Novaes, 2014; Costa, 2015)，希望他能持續民進黨在嘉義縣的執政；此外，陳縣長也非常重視此項資源的分配，不論是為了追求政績，或是為了派系運作轉型，或是改善縣府與村里的互動關係，此項資源可以說是陳縣長手中很重要的戰略性資源。

綜合上述，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是：在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上，陳縣長的影響力較大，立委們的影響力較小。

倘若本文第一個假設是對的，則陳縣長會如何分配此項資源呢？筆者認為陳縣長的連任之路有兩個關卡，第一個關卡是民進黨內的縣長初選，第二個則是嘉義縣長選舉，過去文獻指出有時候黨內初選制度對現任政治人物的影響更大 (Siavelis & Morgenstern, 2008)，因此本文從民進黨內的初選制度及嘉義縣內的派系狀況來進行分析，茲分述如下：

第一，民進黨內的初選制度使陳明文縣長必須提防未來可能的挑戰者。陳明文縣長在 2001 年從國民黨轉換至民進黨，在歷經民進黨內初選民調後，以很小的差距勝過原本看好的何嘉榮。陳縣長的民進黨齡很短，在當時，民

28 例如 Novaes (2014) 認為有些地方的政治人會換黨，主要原因是他們的政黨意識不強，但能動員當地的一些選民，因此待價而沽，而會投靠出價最高的政黨；Costa (2015) 則認為政黨會傾向吸引具有某些特性的地方團體，例如追求該團體利益的，及該團體成員比較容易改變其支持對象且政治資訊較缺乏的。

進黨內存在許多的山頭，就當選的立委來說，有曾擔任過布袋鎮長的蔡啓芳，有擔任嘉義縣黨部主委的何金松，以及當時雖以無黨籍身分參選，但後來進入民進黨的張花冠立委，這三人當中，只有張花冠是陳縣長的盟友，其他兩人則是民進黨內既有的山頭勢力，陳縣長若想要連任，就必須先贏得縣長的初選，並記取他在 2001 年民進黨嘉義縣長初選中險勝何嘉榮的經驗，小心提防其他可能參選人的挑戰（Cox & Rosenbluth, 1996; Novaes, 2014），²⁹故陳縣長應會在一定的程度上，壓制民進黨內的其他山頭力量，以免他們坐大來挑戰縣長寶座。

第二，民進黨的縣長提名制度使陳縣長必須保持一定的自主性。當時民進黨在嘉義縣內的勢力處於擴張階段，但並不穩固，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陳明文縣長已經在 2001 年的選舉中證明其動員民眾及掌握選票的能力，但也有可能會因民進黨中央別的考量而更換由其他人參選下屆縣長，因此陳縣長必須回應支持者的需求，鞏固自己的派系力量（Novaes, 2014; Coman, 2016; Nichter, 2008），³⁰如此才能在未來與民進黨的談判中，待價而沽，獲得較多的利益。

第三，陳縣長的派系背景及多年從政經驗，使他擁有較多的選區與選民資訊，對於各派系的動員力量及掌握選票能力有深入了解，依據理論，在資訊較多的情況下，他會傾向將資源分配給動員能力較高的團體，這可能包含他本身的支持者及較容易收買的游離者（Gottlieb & Larreguy, 2015; Cox & McCubbins, 1986; Dixit & Londregan, 1996; Novaes, 2014; Costa, 2015）。

第四，從爭功（credit claiming）的角度來看，社區發展是陳縣長的主要政見之一，倘若成功，則陳縣長希望能夠獨佔此項政績（Coman, 2016），避免其他地方政治人士也來搶功（Lee, 2003; 賴映潔、王宏文，2013），因此，陳縣長爲了避免未來競爭者的搶功，會想辦法與自己盟友來獨佔此項政績，

29 過去研究顯示因行政首長屬於 SMD 制，因此在首長選舉競爭中，往往會形成政黨對決，因此分裂投票的可能性較低（Frymer, 1994；吳怡銘，2001）。

30 Novaes（2014: 2）認爲政黨會拉攏地方領導人，地方領導人也會待價而沽，因此陳縣長雖然在 2001 年的縣長選舉中投靠民進黨，但民進黨仍有可能會在下一次縣長選舉中拉攏其他地方領導人，因此陳縣長的最佳策略應是維持自己團體的實力，以利未來的討價還價。

陳縣長應會傾向將此項資源分配到林派及張花冠立委的地盤之中。

第五，從林派的角度來看，傳統派系運作模式已到了需要轉型的階段，社區發展協會是一個可能的途徑，因此在陳縣長的主導下，應該會想辦法取得補助來進行派系運作的轉型，以利未來發展，³¹ 因此陳縣長也有誘因將社區發展資源優先挹注到其派系的地盤中。

綜合上述，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設是：若陳縣長可以主導此資源在嘉義縣內的分配，則他會優先分配到自己與張花冠立委的地盤，並會避免分配到民進黨內其他立委當選人的地盤。

最後，在 2001 年的縣長選舉中，陳縣長僅是險勝，得票率並未超過 50%，顯示其仍應積極擴張票源，³² 在當年的立委選舉中，共有八位主要候選人，四位當選人包含無黨的張花冠，民進黨籍二人，及國民黨的李雅景，四位落選的候選人也代表縣內不同的山頭勢力，他們在落選之後，比較不會對陳縣長未來的連任產生威脅，因此反而可能是可以拉攏的對象 (Costa, 2015)。³³ 因此本文的第三個假設是：陳縣長可能會對落選的立委候選人進行拉攏，將社區營造資源分配到部分落選者的地盤之中。

肆、研究方法

本文採用量化的研究方法來探討社區營造資源在嘉義縣內各村里的分配情況為何？到底是縣長還是立委在主導此項資源的分配？其分配的策略與行又是如何受到政黨及派系的影響？依據 Gerring (2004: 343 表 1)，在本質上，本文是屬於第二型的個案研究法，其研究效度僅限於當時嘉義縣內的情況，

31 湯京平、陳冠吾 (2013) 發現陳明文縣長對於社區營造與發展非常重視，在這過程中不僅促進了社區的發展，也展現原本以利益輸送為主的派系網絡，可以轉化成公民參與及市民社會的基礎，故陳縣長有可能透過這項資源的分配來鞏固及擴充派系的政治能量。

32 盛杏媛 (2000) 指出現任政治人物有兩種基本策略，一是維持票源策略，二是積極拓展票源策略，對於剛當選的陳縣長，因得票率不高，故應採取第二種策略。

33 Costa (2015: 171) 指出對於那些在過去選戰中從來沒有改變支持對象的，現任者應當避免將肉桶分配給他們，因此陳縣長的優先分配對象應是以過去曾經換黨的立委落選人地盤為主。

且因缺乏跨縣市的研究，因此無法將研究結果推論到其他縣市，也無法作成因果推論（causal inference）或是估計主要變數的影響程度（causal effect）。但本文透過深入的個案研究，仍具有一些優點，例如本文可形成敘述性的推論（descriptive inference），也就是透過前述研究假設的推導與資料的蒐集與分析，可以回答嘉義縣的分配狀況為何，以及如何分配等問題，也就是可以回答 what 及 how 的問題；其次，本文也嘗試打開政治人物分配行為的黑盒子，以了解政治人物為何如此分配的可能機制（causal mechanisms），透過過去文獻整理可能影響的因素，以及研究假設的推論，來探討政治人物在進行分配時，會考慮哪些因素，以及可能的路徑或機制；最後，本文在本質上是屬於探索型的研究，也就是透過此個案來分析政治人物如何將資源分配給不同的地方派系（Gerring, 2004: 346-350）。

學者在過去分配政治的相關研究中，多是先將選區劃分成較小的地區，也就是研究中的分析單位，然後依據政黨或是個人在各區的得票率，將其分類為支持團體與游離團體的地盤，然後再分析被分配之資源會落在那些地區，以此來判斷政治人物的分配行為（Cox & McCubbins, 1986; Lindbeck & Weibull, 1987; Dixit & Londregan, 1996; Fishback et al., 2003; McGillivray, 2004; Larcinese et al., 2006; Horiuchi & Lee, 2008; Vaishnav & Sircar, 2012）。本文延續過去研究，分析單位也以地理單位為主，但不同的是本文使用村里為分析單位。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本文所探討的社區發展資源的補助是以社區發展協會為主，而社區發展協會與村里的地理範圍大多是相似的，換句話說，哪個社區發展協會獲得補助，也就是某村里獲得補助。

第二，我國中選會有提供各村里的投開票資料，因此可以從這些資料中，了解不同候選人在各村里中的得票數，以及相關的資訊。

第三，村里長是我國最基層的民選首長，也是派系中的基層幹部（陳介玄，1997；丁仁方，1999；王金壽，2004b），派系常透過村里長或該地區所選出的鄉民代表來動員選民，因此村里的投票狀況反映了各派系的勢力狀況；此外，依據 Gottlieb & Larreguy（2015）的理論，村里長或地方派系人物是政治人物在各村里之代理人，因此村里的投票狀況反映各政治人物在該

村里的勢力，是一個合適的分析單位。

本文試圖探索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在 2002~2005 年，也就是陳明文縣長第一任任期間內的分配行爲。在研究策略上，依變數是各村里是否獲得補助案，自變數則包括以下三類變數。³⁴

1. 陳明文縣長在 2001 年縣長選舉中的高度支持區，中度支持區，以及低度支持區。
2. 立委當選人與立委落選人的地盤。
3. 2001 年嘉義縣長選舉中，各村里之選舉人數（以千人爲單位）。

以下針對各變數進行說明。在依變數方面，如果某村里有獲得補助，則依變數數值爲 1，反之爲 0。主要的原因是因爲官方網站上的資料並未公開各補助款項的實際金額，因此筆者僅能以某一村里有沒有獲得補助爲編碼原則來進行分析。資料來源爲行政院內政部「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的歷年補助資料庫，筆者選取陳明文縣長第一任期中（2002 年~2005 年），嘉義縣所獲得的補助資料。³⁵

通常這些補助計畫的名稱會包含其具體的地名，例如 2006 年嘉義縣所獲得之「嘉義縣民雄鄉福樂村公園景觀規劃」之補助，因此筆者依據其補助名稱上的地名找出地址，然後透過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 GIS）軟體來將所有相關計畫對應至所屬之村里當中，得到各村里所獲得的城鄉風貌補助計畫數量，筆者統計共有 90 筆可辨別的補助款，其地理分布如圖 1 所示，此外，因有 2 個村里在這四年中獲得三筆的補助，另外有 11 個村里獲得 2 筆的補助，因此獲得補助的村里數爲 75 個，並以此產生依變數的數值。³⁶

34 三類自變數之資料來源皆爲中選會選舉資料庫（中央選舉委員會，2016）。

35 「創造臺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由民國 88 年起至 97 年止由內政部營建署爲主管機關，各地方政府爲執行機關。資料來源爲內政部營建署所提供之城鄉風貌學習輔導暨專案管理中心計畫資訊平台（內政部營建署，2011）。而該計畫自民國 98 年起至 101 年則改名爲「臺灣城鄉風貌整體規劃」，主管機關相同，故本研究將後者資料庫延續使用。然而上述網站上並無提供各年補助計畫的細項資料，因此筆者向內政部營建署提出申請，得到 2002 年至 2005 年的細項資料。

36 筆者統計在 2002 年至 2005 年之間，嘉義縣共獲得 109 個計畫的補助，但每年皆會有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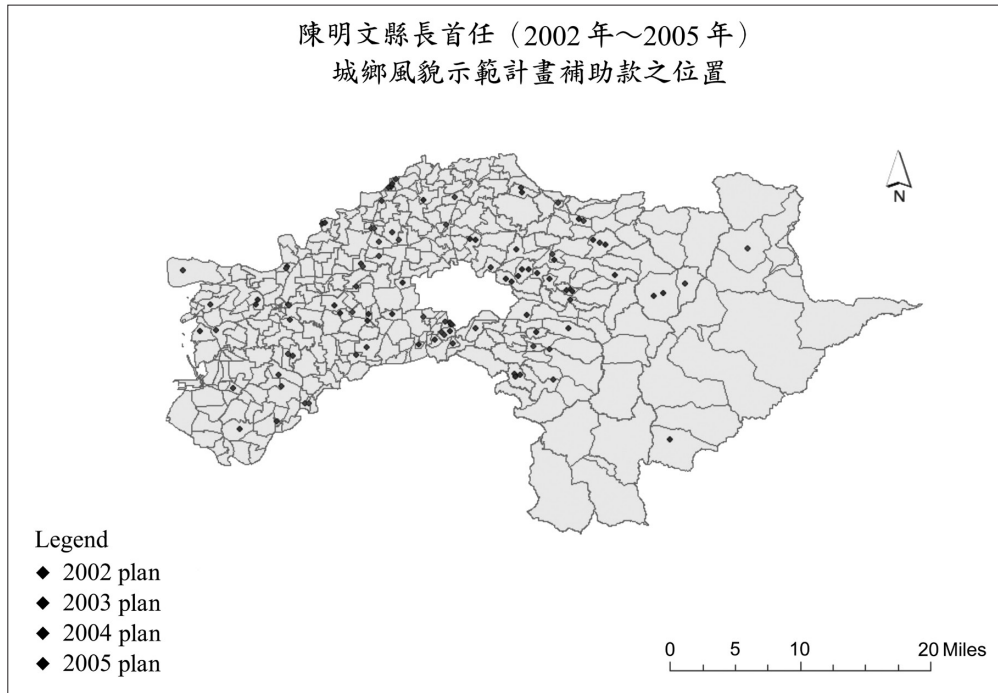


圖 1 陳明文縣長第一任內獲得城鄉風貌示範計畫補助之地理位置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自變數的選擇上，本文的第一個自變數是將嘉義縣各村里依據陳縣長在 2001 年縣長選舉中於各村里得票數的多寡，區分成三類，也就是高度、中度、與低度支持區。³⁷ 這樣的分類方式與傳統分配政治文獻中，以政治人物

是屬於整體規劃的案子，例如「嘉義縣環境景觀總顧問計畫」、「嘉義縣社區規劃師計畫」、「嘉義縣推動督導顧問計畫」或是「嘉義縣城鄉風貌整體發展綱要計畫」等。此外，還有一些大區域的計畫，無法定位在某一村里，因此最後得到 90 筆可辨識到村里的計畫案。其中有 2 個村里獲得 3 筆補助，11 個村里獲得 2 筆的補助，有 62 個村里獲得 1 筆補助，因此獲得補助的村里數為 75 個（ $2+11+62=75$ ）。

37 嘉義縣境內共有 357 個村里，筆者將這些村里分為三類，每一類有 119 個村里。分類方法與編碼方式如下：首先依照陳縣長在各村里的得票數從大到小排序，前三分之一的村里為高度支持區，中間為中度支持區，最後三分之一為低度支持區。筆者並建構兩個虛擬變數，分別為高度支持區與中度支持區，也就是以低度支持區為參考組或基準組。此外，將嘉義縣所有村里區分為三類，主要的原因是參考過去分配政治文獻中，常探討政治人物會將資源分配給支持者、游離者，與反對者等三類，因此本文也將所有村里分類成三類，只是定義有所不同。

在各村里之得票率來衡量各村里的支持程度是不同的。主要的原因是，筆者認為現任政治人物的主要目的是要極大化所能得到的選票（Case, 2001），過去有些文獻以得票率作為分類標準，忽視了各村里的選舉人數有很大的差異，得票率很高的村里不見得能幫助縣長獲得很多的選票，縣長需要足夠多的選票數才能獲得勝選，因此選票數才是關鍵（吳偉立、洪永泰，2005: 192），故依據前面本文的研究假設，陳縣長若能主導資源的分配，則會將資源分配至陳縣長的地盤，在這裡，本文定義陳縣長的地盤是高度支持區與中度支持區，因為這些區域才是陳縣長未來獲得選票的主要區域。

本文的第二個自變數是各立委當選人及立委落選人的地盤。³⁸ 因當時立委選舉為 SNTV 制，過去研究顯示立委在 SNTV 選制下會努力爭取個人選票，也就是會經營個人地盤，但要如何衡量各位立委參選人的地盤呢？³⁹

筆者將焦點集中在每位立委於各村里所得到的選票數，因為立委們想要連任，最重要的是要最大化得票數，因此某立委在哪些村里獲得較多的票數，這些村里就是這立委的地盤，必須努力經營，以維持或提高在這些村里的得票數。⁴⁰ 本文參考吳偉立與洪永泰（2005: 192），提出一個簡易但很符合直覺的衡量方式，也就是針對每一位立委，依據其在各村里的得票數排序，本文將得票數在前 10% 的村里定義為該立委參選人的強地盤，將得票數在前 10~20% 的村里定義為該立委參選人的弱地盤，其餘地區則不屬於該議員之地盤。

38 本文的研究假設認為陳縣長會主導此項資源的分配，並對某些地方人士招降納叛，因此落選的立委參選人也是陳縣長的目標人選，有可能將此項資源分配到這位立委候選人的地盤村里，因此我們也依照上述方法來衡量立委落選人的強地盤與弱地盤。

39 臺灣過去研究中，有許多學者提出地盤的衡量方式，如洪永泰（1999）是以候選人得票的離散程度來判別組織票與形象文宣的參照指標，林繼文（1999）採用相對應分析法來檢測地方派系的得票分布情況及強度，盛杏媛（2000）則利用標準差來衡量各政黨在民主化前後得票集中度的變化，徐永明（2001）則是利用 EI Model 整合總體與個體層次來檢測各地選民的忠誠度。但這些研究大多是在檢視政治人物在一個選區內組織票或地盤的多寡強弱，並沒有去標明哪些次選區是屬於誰的地盤。

40 依據前述文獻，若原本支持某立委的村里，因某些原因而改變投票傾向，則這位立委在這些支持村里的得票數減少，則這位立委就必須從其他原本不是那麼支持他的村里多得一些票來彌補，也就是採取 vote buying 的策略，但這策略會受到許多因素的限制，其成效是不確定的。

在控制變數上，筆者考量本計畫資源的分配，很難有客觀的標準來決定社區營造的優先順序，因此僅選擇各村里的選舉人數做為控制變數（Crisp & Desposato, 2004: 146），主要的原因是若某村里獲得創造城鄉新風貌的資源補助，因此其效益會由當地的所有人來分享，⁴¹ 因此現任政治人物可能會傾向將這類資源分配到人口數多的地區，特別是選票多的地區，來討好人數較多村里中的選民。⁴²

伍、分析結果

首先，本文整理社區營造資源在 2002~2005 年之間，到底分配到哪些地區，並聚焦於分配到各立委參選人地盤的情況，分配的情況如下表 2 所示：

表 2：立委參選人強地盤村里獲得補助之比率

	立委當選人的強地盤				立委落選人的強地盤			
	張花冠	蔡啓芳	何金松	李雅景	張淳美	陳適庸	蔡吉輝	黃譯輝
獲得補助的村里數	17	9	6	13	8	13	9	11
立委參選人強地盤 獲得補助的比率(%)	47	25	17	36	22	36	25	3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2 顯示的是社區營造資源分配到各立委參選人強地盤的情況，因嘉義縣共有 357 個村里，每個立委參選人得票數前 10% 的村里即為強地盤，故每位立委參選人的強地盤村里數為 36 個，從表 1 中每位立委參選人強地盤獲得補助的比率來看，獲得補助比率最高的是張花冠立委的強地盤（47%），其次是國民黨李雅景與落選的陳適庸的強地盤（36%），再其次則是落選的黃譯輝的強地盤（31%）。獲得補助比率最低的則是民進黨立委當選人何金松的強地盤（17%），再來則是落選的張淳美（22%）與蔡啓芳、蔡吉輝等（25%）。

41 這是因為社區營造計畫的性質多是屬於地方性的公共財，不能以經濟有效的方式排除該村里內其他人的使用，且其效益也不會因其他人的使用而減損。

42 筆者將主要變數的說明與操作型定義整理於附錄一，請讀者參考。

這樣的分布狀況與一般認為現任縣長會照顧同黨立委地盤的想法不同，但是與本文的研究假設是相符的。因本文認為陳縣長在 2000 年脫離國民黨，帶槍投靠民進黨，在 2001 年縣長選舉中驚險獲勝，雖然為民進黨贏得嘉義縣首次的執政權，但要連任，首先面臨的就是民進黨內山頭的挑戰，特別是民進黨籍立委當選人的可能挑戰，因此表 2 顯示民進黨籍三位的立委候選人，除了張花冠立委是陳縣長盟友而獲得較多補助之外，蔡啓芳與何金松的強地盤村里獲得補助的比率竟是最低的，甚至低於國民黨李雅景強地盤獲得補助的比率，這顯示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是以陳縣長的意志為主，優先的補助對象是陳縣長的盟友張花冠立委，並壓抑蔡啓芳與何金松地盤獲得補助的比率。

此外，陳縣長為了追求連任，也會積極的招降納叛，表 2 顯示陳縣長招降納叛的優先者是李雅景與陳適庸的強地盤，依據前述，李雅景是國民黨黃派的掌門人，從嘉義縣地方派系概略的勢力來看，黃派、林派與民進黨的地方勢力比約是 4:3:3 (湯京平、陳冠吾，2013: 112)，因此若陳縣長所代表的林派能與民進黨保持長期合作，則民進黨可望在嘉義縣長期執政，國民黨的黃派將成為長期的在野黨，黃派成員為了追求個人利益，有可能會投向陳縣長陣營，加入執政聯盟。

在陳適庸方面，陳適庸原本是國民黨籍的嘉義縣長，但與李雅景衝突之後，離開國民黨，加入親民黨，在 2001 年立委選舉落選之後，其所代表的地方勢力應已沒有足夠的力量在未來縣長或立委層級的選舉當選，但仍有一定的實力，且陳適庸代表的是陳縣長敵人的敵人，在過去選舉中也有合作的經驗 (陳璿仁，2002: 106-108)，因此成為陳縣長主要拉攏的對象。

為了更進一步檢視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情況，本文使用 logit 迴歸模型來檢視影響各村里獲得補助的因素為何？表 3 呈現了五個模型下的估計結果。

表 3：統計分析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選舉人數（千人）	-0.01 (0.24)	0.46 (0.24)	-0.04 (0.33)	-0.09 (0.36)	-0.61 (0.48)
陳縣長高支持區	1.46*** (0.48)		1.50*** (0.50)	1.63*** (0.53)	1.71*** (0.52)
陳縣長中支持區	1.10*** (0.39)		1.06*** (0.40)	1.09*** (0.40)	1.20*** (0.41)
李雅景強地盤		0.42 (0.47)	0.56 (0.47)	0.63 (0.49)	0.82* (0.49)
張花冠強地盤		1.01** (0.43)	0.92** (0.44)	0.75* (0.46)	1.18** (0.48)
蔡啓芳強地盤		-0.75 (0.56)	-0.64 (0.53)	-0.68 (0.57)	-0.62 (0.55)
何金松強地盤		-0.99 (0.63)	-0.88 (0.58)	-0.93 (0.66)	-0.93 (0.62)
李雅景弱地盤				0.39 (0.43)	
張花冠弱地盤				-0.85 (0.54)	
蔡啓芳弱地盤				-0.04 (0.47)	
何金松弱地盤				0.23 (0.48)	
張淳美強地盤					0.24 (0.55)
陳適庸強地盤					1.13** (0.54)
蔡吉輝強地盤					0.26 (0.48)
黃譚輝強地盤					0.03 (0.56)
樣本數	357	357	357	357	3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在這五個模型中，我們都有納入控制變數，也就是各村里內的選舉人數，原本預期選舉人數越多，則越有可能獲得補助，但這五個模型的估計結果皆顯示其不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因此各村里的選舉人數不會影響其獲得補助的機率。

模型一想要檢視各村里對於陳縣長的支持程度，是否會影響其獲得補助的機率，估計結果顯示，相對於低度支持區，表 3 結果顯示高度支持陳縣長與中度支持陳縣長的村里有較高的機率，可以獲得補助。

模型二則是想要檢視，若立委們主導此項資源的分配，則哪些現任立委的地盤獲得補助的機率會比較高？統計結果顯示，相較於不是這些立委們強地盤的村里，只有屬於張花冠立委強地盤的村里有較高的機率獲得補助，其他立委們的強地盤在獲得補助的機率上並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效果，甚至從係數估計值的符號來看，屬於何金松與蔡啓芳強地盤的村里獲得補助的機率反而是比較低的，只是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

模型三則是要檢視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究竟是由陳縣長還是現任立委們來主導，統計結果顯示屬於陳縣長高度支持區與中度支持區的村里有較高的機率獲得補助，此外，屬於張花冠立委強地盤的村里也有較高的機率獲得補助，其他自變數則沒有統計上的顯著效果。這結果隱含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是由陳縣長與張花冠立委所主導的，因此才會將此資源分配到屬於自己地盤或支持自己的村里之中，這也驗證了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設。

模型四則是想更進一步確定模型三的結果，因此在此模型中納入各立委當選人的弱地盤，統計結果是與模型三的結果相似的，且各立委弱地盤自變數沒有一項是顯著的。

模型五則是在模型三的基礎上，再加上立委選舉落選人的強地盤變數，結果顯示陳縣長與張花冠立委的係數估計值與前面幾個模型的估計值是相似的，且都具有正向的統計顯著性，值得注意的是結果顯示屬於陳適庸強地盤的村里有比較高的機率獲得補助，顯示陳縣長似乎有刻意在拉攏屬於陳適庸地盤的村里，這也驗證了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假設，也就是陳縣長為了在未來縣長選舉中連任，可能會攏絡一些立委落選人，本模型的結果顯示陳縣長的主要拉攏目標是陳適庸，這是因為陳適庸本身雖有一定的地方勢力，但並沒

有強到會在未來嘉義縣的縣長及立委選舉中獲勝，因此不會對陳明文縣長造成威脅，且他是從國民黨轉到親民黨的前任縣長，與國民黨立委李雅景有矛盾，算是陳縣長主要敵人的敵人，因此可以拉攏之。

最後，表 3 中模型二到模型五的結果，蔡啓芳與何金松強地盤的係數估計值都是負的，雖然都不具統計上的顯著性，但這負的係數值顯示在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上，屬於蔡啓芳與何金松強地盤的村里獲得補助的機率是較低的，兩位都是屬於民進黨籍的立委，為何會在這項資源的分配上不僅沒有優勢，反而還是相對弱勢的，甚至比屬於國民黨李雅景強地盤的村里獲得補助的機率還要低？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民進黨縣長初選制度所造成的結果，也就是陳縣長為了連任，必須壓抑民進黨內可能挑戰對手的地方勢力，而現任民進黨籍立委是陳縣長最大的假想敵，因此在此項資源的分配上，刻意壓抑屬於這兩位立委地盤的村里，不願意讓這些村里在任期間獲得補助，這結果符合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設。

陸、結論與討論

本文以量化的研究方法來探討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會優先分配給誰，本文在回顧相關文獻後，發現現任政治人物在決定優先分配給支持者或是游離者時，會考慮一些因素，例如大選與黨內初選制度、被分配資源的決策程序與制度、選民的特性與嗜好、現任政治人物的特性與策略等。

本文根據上述影響因素，檢視嘉義縣內民進黨的初選制度、社區營造補助的實際申請與審核狀況、政黨及派系山頭的勢力，以及陳明文縣長的特性等因素之後，推論得到三個研究假設，並進行實證研究，統計結果支持這三項研究假設，即在嘉義縣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上，陳縣長的影響力較大，立委們的影響力較小；此外，在資源補助的分配上，陳縣長的地盤、張花冠立委（陳縣長的盟友）的地盤，以及立委落選人陳適庸的地盤村里有較高的機率獲得補助，相對來說，民進黨籍的立委當選人何金松與蔡啓芳的地盤獲得補助的機率是較低的。

換言之，擁有許多在地資訊的陳縣長主導了社區營造資源的分配，因為

陳縣長的派系背景與過去從政經驗，他可以知道哪些派系或山頭勢力的政黨偏好較低，哪些比較容易被收買，哪些的動員能力強而值得收買，故在分配時，會考慮收買的成本風險與可能效益，如此才會決定將社區營造資源優先分配給支持的派系盟友及一位立委落選人，並避免將資源分配給同屬民進黨的立委當選人，後續的選舉結果也顯示陳縣長的分配策略是有效的。

本文結果顯示過去分配政治文獻中，以選民對於現任政治人物的支持程度來區分成支持者與游離者是不夠精細的，對於擁有許多在地資訊的現任政治人物而言，並不是所有的支持者與游離者都是相同的 (Costa, 2015: 169)，過去研究顯示不論是支持者或游離者，其內部各小團體的動員力量，政策偏好與程度，及政治目的是不同的 (Cox & McCubbins, 1986; Dixit & Londregan, 1996; Novaes, 2014; Costa, 2015 ; Gottlieb & Larreguy, 2015)，因此肉桶收買的成本、風險、與預期效益是不同的，故對於某些收買成本較低、風險較低、或預期效益較高的地方派系與山頭勢力，現任者就會優先用肉桶來收買之。

本文以嘉義縣為研究個案，探討政治人物分配行為背後的機制與考慮因素，研究結果也支持上述推論，擁有許多資訊的現任者會在支持者與游離者中，選擇具有一定特性的小團體或地方派系來作為優先分配的對象，即將肉桶利益優先分配給動員能力較強、對政黨偏好程度較低、以私人利益為主、比較容易收買、且不會對自己政治生涯產生威脅的小團體或地方派系。

最後，在研究限制上，依據 Gerring (2004)，本文係採取了個案研究法第二類型的研究方法，其優點是能夠深入了解此個案的背景脈絡與利害關係人所可能採取的策略，可進行敘述性的推論及了解政治人物分配行為背後的可能機制與影響因素，但其主要缺點是缺乏跨縣市的研究，故無法進行因果推論及估計影響程度等，此外，本文的外部效度會受到一定的限制，也就是本文的研究結果可能無法適用於其他縣市或其他案例。

但本研究仍有可能對於其他案例提供一些洞見，為了發揮此一功能，筆者將本案例的可能貢獻列舉如下，希望能提高本文的外部效度及對未來相關研究的啟發 (Gerring, 2004: 345-346)。本文的主要可能貢獻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本文提出一個衡量地方派系地盤的變數，或可作為未來地方派系研究中可以使用的指標。本文參考吳偉立與洪永泰 (2005) 所提出用來衡量

立委參選人在其選區中得票數量分布情況的變數，因每位立委參選人皆是不同地方派系或山頭之主要領導人，因此筆者利用立委參選人的強弱地盤變數來找出各地方派系的主要勢力是在哪些村里，也就可以衡量地方派系的地盤在哪裡。

過去我國學者在地方派系相關研究上，因很難取得派系的內部資訊，在參與觀察或訪談上遭遇許多困難，因此大多將研究重心放在派系結構的轉變與消長、與國民黨的關係或轉變、對地方政治及民主化的影響、派系分贓、及其在選舉中的角色、動員情況、與競爭態勢等，並大多以派系為研究主體或分析單位來進行分析（王金壽，2004a；王業立、蔡春木，2004；王業立，1998；陳東升，1995；湯京平、陳冠吾，2013；趙永茂，2004），惟很少納入地方派系地盤此一重要變數，也就忽略地方派系一項很重要的特性，也就是其地域特性，未來或許可以利用此變數來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例如在地方派系於選舉中的角色、動員能力、與影響力上，可以利用此變數作更細緻的分析；在地方派系的消長研究及派系分贓上，也可利用此派系地盤變數來作更深入的探討。

第二，本文所推論及發現之政治人物的分配行為，或許可以用來分析處於類似情境下，政治人物可能採取的分配策略。在本文中，陳縣長所面臨的政治環境是嘉義縣內不同的派系與山頭勢力。因為他剛帶槍投靠民進黨，以極小的差距贏得縣長選舉，雖獲得民進黨中央的支持，但仍須面對嘉義縣內不同派系的競爭，特別是民進黨內的山頭勢力，有可能會想要取而代之。此外，過去幾年嘉義縣內的派系與山頭勢力一直在重整，今天的敵人可能是明天的朋友，且每個派系或山頭又具有不同的勢力範圍及動員能力，對不同政黨或陳縣長也有不同的策略偏好程度。

陳縣長的目的是要連任縣長，但其所面臨的關卡有兩個，第一個是民進黨內的初選制度，他必須提防民進黨內未來可能的挑戰者；第二個關卡是縣長大選，由於陳縣長在第一次縣長選舉中的得票率是 47%，不及五成，因此陳縣長應該要積極擴張票源，增加可能支持的選民。

在前述的情況下，具有豐富當地政治資訊陳縣長，對於縣內的派系勢力及生態有深入的了解與內部資訊，就有可能採取上述的分配策略，並反映在

此項資源的分配上。而本文所研究的社區營造資源，也具有一些特性，首先，這是陳縣長很重視的一項戰略性資源，而其他政治人物並沒有很重視此項資源，雖然這是一項由中央政府核定的補助，但實際上，陳縣長有運用一些方法來主導其分配；其次，此項資源的分配與其他資源的分配似乎沒有關聯性，這是因為當時各村里對於此資源並沒有特殊的偏好或需求，也沒有一定的篩選標準來決定哪些村里應當優先獲得此資源，因此不會影響或受其他資源分配的影響。

綜合上述，本文的研究結果顯示擁有地方政治資訊的政治人物，在面對地方不同的派系勢力與生態時，想要競選連任，必須通過黨內初選及大選的考驗，因此，會將一項尚未被其他政治人物注意到的戰略性資源，在支持者與游離者中，優先分配給動員能力較強、對政黨偏好程度較低、以私人利益為主、比較容易收買、且不會對自己政治生涯產生威脅的小團體或地方派系。

附錄一：主要變數之說明與操作型定義

變數屬性	變數名稱	變數說明	操作型定義
依變數	某村里是否獲得補助	在陳明文縣長第一任期中(2002~2005年),某村里是否有獲得創造城鄉新風貌計畫的補助。	若某一村里在2002~2005年間,有獲得該計畫的補助,則本變數的數值為1,否則為0。
自變數	陳縣長高度支持區	陳明文在2001年縣長選舉中,得票數最高的前三分之一的村里。	將嘉義縣內各村里,依照陳明文於2001年縣長選舉中在各村里之得票數,從大到小排列,若某村里是在前三分之一者,則此變數的數值為1,否則為0。
自變數	陳縣長中度支持區	陳明文在2001年縣長選舉中,得票數在最高的三分之一與三分之二之間的村里。	將嘉義縣內各村里,依照陳明文於2001年縣長選舉中在各村里之得票數,從大到小排列,若某村里是在前面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者,則此變數的數值為1,否則為0。
自變數	某立委參選人之強地盤,以李雅景為例	在2001年立委選舉中,李雅景得票數最高之前10%的村里。	將嘉義縣內各村里,依照李雅景於2001年立委選舉中在各村里之得票數,從大到小排列,若某村里是在前面10%者,則此變數的數值為1,否則為0。
自變數	某立委參選人之弱地盤,以李雅景為例	在2001年立委選舉中,李雅景得票數最高之前10%~20%的村里。	將嘉義縣內各村里,依照李雅景於2001年立委選舉中在各村里之得票數,從大到小排列,若某村里是在前面10%~20%者,則此變數的數值為1,否則為0。
自變數	選舉人數(千人)	各村里的選舉人數。	在2001年縣長選舉中,各村里的選舉人數除以1,00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參考資料

A. 中文部分

丁仁方

- 1999 〈統合化，半侍從結構，與台灣地方派系的轉型〉，《政治科學論叢》10: 59-82。
(Ting, Jen-fang, 1999, "Corporatization, Semi-Cliente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aiwan Local Factions,"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0: 59-82.)

中央選舉委員會

- 2016 〈中選會選舉資料庫〉。2016年9月24日，取自 <http://db.cec.gov.tw/>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2016, "The Election Results Database of the Central Election Commission," Retrieved September 24, 2016, from <http://db.cec.gov.tw/>)

內政部營建署

- 2011 〈內政部營建署魅力城鄉主題網〉。2016年9月24日，取自 <http://trp.cpami.gov.tw/ch/index.aspx>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Agency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2011, "Town-scape Renaissance Project," Retrieved September 24, 2016, from <http://trp.cpami.gov.tw/ch/index.aspx>)

王志良、詹富堯、吳重禮

- 2012 〈鞏固支持或資源拔樁？解析中央對地方補助款分配的政治因素〉，《政治科學論叢》51: 51-90。(Wang, Chih-liang, Fu-yao Chan, and Chung-li Wu, 2012, "Consolidation Support or Targeting the Opposition?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Factors on the Allocation of Intergovernmental Grants,"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1: 51-90.)

王金壽

- 2004a 〈瓦解中的地方派系：以屏東為例〉，《台灣社會學》7: 177-207。(Wang, Chin-shou, 2004a, "Collapsing Local Factions: The Case of Ping-Tung," *Taiwanese Sociology* 7: 177-207.)
2004b 〈重返風芒縣：國民黨選舉機器的成功與失敗〉，《台灣政治學刊》8(1): 99-146。(Wang, Chin-shou, 2004b, "Returning to Feng-Mang County: The Success and Failure of the Kuomintang Political Machine," *Taiw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 99-146.)

王振寰

- 1998 〈地方派系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國策專刊》1: 6-8。(Wang, Jenn-hwan, 1998, "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Local Factions," *National Policy Dynamic Analysis* 1: 6-8.)

王業立

- 1998 〈選舉、民主化與地方派系〉，《選舉研究》5(1): 77-94。(Wang, Yeh-lih, 1998, "Election, Democratization, and Factionalism,"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5(1): 77-94.)

王業立、蔡春木

- 2004 〈從對立到共治：台中縣地方派系之轉變〉，《政治科學論叢》21: 189-215。(Wang, Yeh-lih and Chun-mu Tsai, 2004,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operation: The Change of Local Factions in Taichung County,"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1: 189-215.)

朱雲漢

- 1989 〈寡佔經濟與威權政治體制〉，見蕭新煌等（著），《壟斷與剝削：威權主義的政治

經濟分析》，頁 139-160。臺北：台灣研究基金會。(Chu, Yun-han, 1989, "Oligopoly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pp. 139-160 in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t al. (eds.), *Monopoly and Exploit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alysis of Authoritarianism*. Taipei: Taiwan Research Fund.)

吳怡銘

- 2001 〈台北市選民分裂投票之研究：民國八十七年市長市議員選舉之分析〉，《選舉研究》8(1): 159-209。(Wu, Yi-ming, 2001, "Split-Ticket Voting in 1998 Taipei Mayoral and City Council Election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8(1): 159-209.)

吳芳銘

- 1996 〈地方派系的結盟與分化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和高雄縣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Wu, Fang-ming, 1996, "The Vissitudes of Alliance and Division of the Local Factions in Chiayi County and Kaohsiung County,"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吳偉立、洪永泰

- 2005 〈第五屆立委選舉台聯候選人的得票分布：三種得票離散程度衡量工具的分析〉，《選舉研究》12(2): 189-212。(Wu, Wei-li and Yung-tai Hung, 2005, "The Vote Distribution of the Taiwan Solidarity Union: An Analysis of the 2001 Legislative Election Record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2(2): 189-212.)

呂嘉泓

- 1999 〈我國鄉村社區發展之研究——以山美及蓮潭社區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Lu, Chia-hung, 1999,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 in Taiwan: A Case Study of Shanmei and Lientian Community,"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李俊達

- 2010 〈總統得票率、地方補助款與行程安排之相關性探討〉，《選舉研究》17(2): 71-102。(Lee, Chun-ta, 2010, "The Study on Relationships among Presidential Turnout Rate, Local Grants, and Schedule Arrangement,"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7(2): 71-102.)

林正忠、范振和

- 2009 〈不排除陳明文模式〉。聯合報，7月2日，A4版。(Lin, Cheng-chung and Cheng-he Fan, 2009, "Not Excluded Chen Ming-Wen Model," *United Daily News*, July 02, A4.)

林佳龍

- 1998 〈台灣地方選舉與國民黨政權的市場化：從威權鞏固到民主轉型（1946-94）〉，見陳明通、鄭永年（編），《兩岸基層選舉與政治社會變遷》，頁 169-260。臺北：月旦出版社。(Lin, Chia-lung, 1998, "Taiwan Local Election and the Marketization of KMT Regime: From Authoritarian Consolidation to Democratic Transition (1946-94)," pp. 169-260 in Ming-tung Chen and Yung-nien Cheng (eds.), *Local Election and Political-Social Changes across the Strait*. Taipei: Yuedan.)

林怡均、黃紀

- 2009 〈執政黨資源分配的邏輯：2001~2008年的補助款分析〉，發表於2009年台灣政治學會。新竹：玄奘大學。(Lin, Yi-chun and Chi Huang, 2009, "Distributive Logit of Ruling Party: An Analysis of Grants in 2001-2008," Presented at 2009 Taiwanese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Hsinchu: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林繼文

- 1999 〈單一選區兩票制與選舉制度改革〉，《新世紀智庫論壇》6: 69-79。(Lin, Jih-wen, 1999, "Single-District Two-Votes System and Electoral System Refrom," *New Century Think Tank Forum* 6: 69-79.)

洪永泰

- 1999 〈傳統與現代：八十六年桃園縣長選舉的選後評估〉，《選舉研究》6(2): 1-21。(Hung, Yung-tai, 1999, "The Modernization of Campaign Strategy: A Case Study of 1997 Taoyuan County Magistrate Elec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6(2): 1-21.)

唐賞蓉

- 2002 〈地方派系與民進黨結盟互動之探討：以嘉義縣九十年縣長與立委選舉為例〉，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Tang, Shan-rong, 2002, "A Study on the Alignment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Local Factions and the DPP: A Case Study on the 2001 Chiayi County Governor and Legislator Elections," Master Thesis, Executive Master of Public Affairs, Tunghai University.)

徐永明

- 2001 〈政治版圖：兩個選舉行爲研究途徑的對話〉，《問題與研究》40(2): 95-115。(Hsu, Yung-ming, 2001, "The Two Faces of Political Clustering in Electoral Studies," *Issues and Studies* 40(2): 95-115.)

張茂桂、陳俊傑

- 1986 〈現代化、地方派系與地方選舉投票率之關係：自由派理論的再檢討〉，見中國政治學會（編），《投票行爲選舉文化論文集》，頁487-519。臺北：中國政治學會。(Chang, Mau-kuei and Jun-jie Chen, 1986, "The Relation of Modernization, Local Faction and Local Election: Reexamination of Liberal Theory," pp. 487-519 in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ed.), *Collected Papers of Voting Behavior and Electoral Culture*. Taipei: Chinese Associ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盛杏媛

- 2000 〈政黨或選區？立法委員的代表取向與行爲〉，《選舉研究》7(2): 37-73。(Sheng, Shing-yuan, 2000, "Party-oriented or Constituency-oriented: A Study on Representative Orientations and Representative Behavior of Taiwan's Legislators,"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7(2): 37-73.)

莊卓穎

- 2014 〈臺灣成形中之地方政治新生態初探：從縣市層級選舉觀察臺中市與嘉義縣地方派系〉，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Chuang, Cho-ying, 2014, "A Pioneer Study of the Formation of New Local Political Ecology in Taiwan: Observation of Local Factions in Taichung City and Chiayi County at the County-Level Elections,"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陳介玄

- 1997 〈派系網絡、樁腳網絡及俗民網絡—論台灣地方派系形成之社會意義〉，見東海大學東亞社會經濟研究中心（編），《地方社會》，頁31-6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Chen, Chieh-hsuan, 1997, "Faction Network, Vote Captain Network and Folk Network: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e Formation of Local Factions in Taiwan," pp. 31-68 in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ocieties and Economies of Tung Hai University (ed.), *Local Society*. Tai-

pei: Linking Publishing.)

陳明通

- 1995 《派系政治與台灣政治變遷》。臺北：月旦出版社。(Chen, Ming-tung, 1995, *Faction Politic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aiwan*. Taipei: Yeudan.)

陳東升

- 1995 《金權城市：地方派系，財團與台北都會發展的社會學分析》。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Chen, Dung-shen, 1995, *Money Politics in Cities: Golden City: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Local Factions, Big Businesses, and Taipei Metropolitan Development*. Taipei: Chuliu Press.)

陳泰尹

- 2009 〈民主化後的台灣地方派系：以嘉義縣林派為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Chen, Tai-ing, 2009, “Local Faction in Taiwan after Democratization: A Case Study of Lin Faction in Chiayi County,”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Soci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陳璿仁

- 2002 〈民進黨與地方派系勢力變遷之研究——以嘉義縣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Chen, Hsuan-jen, 2002, “A Study of DPP and Local Faction’s Power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in Chiayi County,”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湯京平、吳重禮、蘇孔志

- 2002 〈從台中縣「地方基層建設經費」論地方派系與肉桶政治〉，《中國行政評論》12(1): 37-76。(Tang, Ching-ping, Chung-li Wu, and Kung-chi Su, 2002, “Divided Government and Local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Budget for Local Infrastructure, Local Factions, and Pork-Barrel Politics in Taichung County,” *The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2(1): 37-76.)

湯京平、陳冠吾

- 2013 〈民主化、派系政治與公民社會：以嘉義縣的社區營造與「終結派系」為例〉，《台灣民主季刊》10(2): 105-137。(Tang, Ching-ping and Kuan-wu Chen, 2013, “Democratization, Faction Politics, and Civil Society: The Case of Community-Building and the ‘Termination of Faction’ in Chia-yi County,”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0(2): 105-137.)

黃榮清

- 2000 〈嘉義縣地方派系結構對選舉影響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Huang, Ron-ching, 2000, “A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Structure of Local Faction in Chiayi on the Election,”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Private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楊永年、王宏文

- 2017 〈台北市里長如何運用里鄰建設服務經費〉，《行政暨政策學報》64: 69-102。(Yang, Yung-nien and Hongwung Wang, 2017, “How the Li Chiefs Use the Li-Lin Infrastructure Funds in Taipei: A Case Study of Xin-Yi District,” *Public Administration & Policy* 64: 69-102.)

趙永茂

- 1978 《台灣地方派系與地方建設之關係》。高雄：德馨室。(Chao, Yung-mau, 1978, *The Relation of Taiwan Local Faction and Local Construction*. Kaohsiung: Te-Shin Room.)
- 2004 〈地方派系依恃結構的演變與特質——高雄縣內門鄉的個案分析〉，《臺灣民主季刊》1(1): 85-117。(Chao, Yung-mao, 2004, “The Changes and Features of Local Factions’ Clientelist Structure—A Case Study of Neimen Township, Kaohsiung County in Taiwan,” *Taiwan Democracy Quarterly* 1(1): 85-117.)

劉如倫

- 2004 〈台灣地方派系與社區營造——以嘉義縣東石鄉船仔頭和永屯社區為例〉，國立中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Liu, Ru-lun, 2004, “Local Faction and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Cases of ChuanZaiTou and Yongtun Community in Chiayi County,”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蔡育軒、陳怡君、王業立

- 2007 〈社區發展協會、選舉動員與地方政治〉，《東吳政治學報》25(4): 93-135。(Tsai, Yu-hsuan, Yi-chun Chen, and Yeh-lih Wang, 2007, “Community Development Associations, Electoral Mobilization and Local Politics,”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4): 93-135.)

蔡英志

- 2006 〈政治生態變遷下地方派系與政黨互動之研究——以嘉義縣陳明文模式為例〉，東海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Tsai, Ying-chih, 2006, “A Study of the Interplay of Local Faction and Party under Political Ecology Transformation: A Case of Chen Ming-Wen Model in Chiayi County,” Master Thesis, Graduate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 Hai University.)

賴映潔、王宏文

- 2013 〈立委選制改變對指定用途補助款分配之影響——第五屆與第六屆的比較〉，《東吳政治學報》31(1): 53-104。(Lai, Ying-chieh and Hongwung Wang, 2013, “The Impact of Legislative Electoral System Changes on Earmarks Distribution Comparisons between the Fifth and the Sixth Legislative Yuan in Taiwan,”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1): 53-104.)

羅清俊

- 2000 〈政策利益分配的型態：最小獲勝聯盟？還是通通有獎？〉，《政治科學論叢》13: 201-232。(Luor, Ching-jyuhn, 2000, “The Pattern of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Policy Benefit: Minimum Winning Coalition? Or Universalism?”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3: 201-232.)
- 2008 〈桃園縣特別統籌款分配的政治分析〉，《東吳政治學報》26(3): 1-56。(Luor, Ching-jyuhn, 2008,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Special General-Revenue-Sharing in Taoyuan County,”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3): 1-56.)

羅清俊、陳文學

- 2009 〈影響原住民政策利益分配的因素：族群代表或選舉競爭？〉，《選舉研究》16(2): 167-207。(Luor, Ching-jyuhn and Wen-hsueh Chen, 2009,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Distribution of Indigenous Grants in Taiwan: Ethnic Minority Representation or Elec-

toral Competi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6(2): 167-207.)

羅清俊、萬榮水

- 1999 〈選舉與補助款的分配：綁樁？還是平衡地方財政？〉，《選舉研究》6(2): 121-161。
(Luor, Ching-jyuhn and Ron S. Wahn, 1999, “Elections and the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of Grants: Political Manipulation or Equalizing Local Finance?”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6(2): 121-161.)

蘇錦章

- 2001 《諸羅春秋》。嘉義：作者自版。(Su, Chin-chang, 2001, *History of Zhu Luo*. Chiayi: Vanity Press.)

B. 外文部分

Anderson, Gary M. & Robert D. Tollison

- 1991 “Congressional Influence and Patterns of New Deal Spending, 1933-1939,”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4(1): 161-175.

Balla, S. J., E. D. Lawrence, F. Maltzman, & L. Sigelman

- 2002 “Partisanship, Blame Avoidance,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Legislative Pork,”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6(3): 515-525.

Case, A.

- 2001 “Election Goals and Income Redistribu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Albania,”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45(3): 405-423.

Coman, E. E.

- 2016 “Local Elite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Central Government Funds,” Coman’s website, Retrieved January 6, 2017, from <http://www.emmanuelcoman.eu/working-papers/>

Costa, C.

- 201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arty Building: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Peru’s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Programme,” *Party Politics* 21(2): 169-182.

Couch, Jim F. & William F. Shugart II

- 1998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Deal*.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Cox, G. W. & M. D. McCubbins

- 1986 “Electoral Politics as a Redistributive Game,” *Journal of Politics* 48(2): 370-389.

Cox, G. W. & F. Rosenbluth

- 1996 “Factional Competition for the Party Endorsement: The Case of Japan’s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6(2): 259-269.

Crisp, B. F. & S. W. Desposato

- 2004 “Constituency Building in Multimember Districts: Collusion or Conflict?” *Journal of Politics* 66(1): 136-156.

Dahlberg, M. & E. Johansson

- 2002 “On the Vote-purchasing Behavior of Incumbent Governm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6(1): 27-40.

Diaz-Cayeros, A., F. Estévez, & B. Magaloni

- 2012 “Strategies of Vote Buying: Democracy, Clientelism and Poverty Relief in Mexico,”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tanford University.

- Dixit, A. & J. Londregan
1996 "The Determinants of Success of Special Interests in Redistribu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Politics* 58(4): 1132-1155.
- Fenno, R. F.
1978 *Home Style: House Members in Their Districts*. New York: Pearson College Division.
- Fiorina, M. P.
1981 "Some Problems in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in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3): 543-567.
- Firth, R.
1957 "Factions in Indian and Overseas Indian Societies, Part 1: Introduction,"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8(4): 291-295.
- Fishback, P. V., S. Kantor, & J. J. Wallis
2003 "Can the New Deal's Three Rs Be Rehabilitated? A Program-by-program, County-by-county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40(3): 278-307.
- Frymer, Paul
1994 "Ideological Consensus within Divided Party Governmen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09(2): 287-311.
- Gerring, John
2004 "What Is a Case Study and What Is It Good fo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8(2): 341-354.
- Golden, M. & B. Min
2013 "Distributive Politics around the World,"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6: 73-99.
- Gottlieb, J. & H. Larreguy
2015 "An Informational Theory of Electoral Targeting: Evidence from Senegal," Working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nnual Meeting. San Francisco, CA.
- Hirano, S.
2006 "Electoral Institutions, Hometowns, and Favored Minorities: Evidence from Japanese Electoral Reforms," *World Politics* 59(1): 51-82.
- Horiuchi, Y. & S. Lee
2008 "The Presidency, Regionalism, and Distributive Politics in South Korea,"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41(6): 861-882.
- Kramon, E. & D. N. Posner
2013 "Who Benefits from Distributive Politics? How the Outcome One Studies Affects the Answer One Get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11(2): 461-474.
- Lancaster, Thomas D.
1986 "Electoral Structures and Pork Barre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1): 67-81.
- Larcinese, Valentino, Leonzio Rizzo, & Testa Cecilia
2006 "Allocating the U.S. Federal Budget to the States: The Impact of President," *The*

- Journal of Politics* 68(2): 447-456.
- Lasswell, H. D. & A. Kaplan
1950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ee, F. E.
2003 "Geographic Politics in the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alition Building and Distribution of Benefi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7(4): 714-728.
- Lindbeck, A. & J. W. Weibull
1987 "Balanced-budget Redistribution as the Outcome of Political Competition," *Public Choice* 52(3): 273-297.
- McGillivray, F.
2004 *Privileging Industry: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ichter, S.
2008 "Vote Buying or Turnout Buying? Machine Politics and the Secret Ballo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2(1): 19-31.
- Novaes, L. M.
2014 "Promiscuous Politicians and the Problem of Party Building: Local Politicians as Party Brokers," Presented at 2015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Lunch.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Siavelis, P. M. & S. Morgenstern
2008 "Candidate Recruitment and Selection in Latin America: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50(4): 27-58.
- Stein, Robert M. & Kenneth N. Bickers
1995 *Perpetuating the Pork Barrel: Policy Subsystems and American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okes, S. C.
2005 "Perverse Accountability: A Formal Model of Machine Politics with Evidence from Argent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3): 315-325.
- Stokes, S. C., T. Dunning, M. Nazareno, & V. Brusco
2013 *Brokers, Voters, and Clientelism: The Puzzle of Distributive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ishnav, M. & N. Sircar
2012 "Core or Swing? The Role of Electoral Context in Shaping Pork Barrel," Working Paper of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 Weghorst, K. R. & S. I. Lindberg
2013 "What Drives the Swing Voter in Af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57(3): 717-734.
- Wright, G.
197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Deal Spending: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6(1): 30-38.

Wu, Nai-teh

1987 “The Politics of a Regime Patronage System: Mobilization and Control within and Authoritarian Regim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Resource Allocation Strategy of Local Factions: A Case Study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Resources in Chiayi County

Hongwung W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Yun-Ling Ko

Master of Public Managem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Public Affair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ing Sun

Bachelor of Scienc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f distributive politics have focused on which types of voters are favored in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Variations across these empirical stud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factors such as the voting system and candidate selection rules, the type of and allocation procedures for resources, the nature of the district's popul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ian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grant allocation of the Townscape Renaissance Project in Chiayi Coun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Magistrate Ming-Wen Chen outweighed that of legislators. In addition, the villages which were the core-constituencies of Magistrate Chen, of the Legislator Hua-Kuan Chang, and of the legislative election loser Shi-Yong Chen, had higher probabilities to receive the grants. This implies that not all support voters and swing voters are the same. The politician who has local information considers the cost, risk and benefit of pork-barrel buying, and allocates in favor of some groups or local factions with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distributive politics, grant, local faction

